

试析英国保守党政府的非殖民化政策(1951—1956 年)

杭 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 北京 100006)

摘要:1951—1956 年英国保守党政府试图弥合衰减的国力和帝国雄心之间的鸿沟,故而采取坚守与撤退并举侧重坚守的政策。坚守政策导致苏伊士运河战争,带来英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急剧衰退;撤退政策提速了加纳独立,部分保留英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力。其教训影响着后任保守党政府的政策。

关键词:英国;保守党政府;殖民撤退;坚守政策;撤退政策

中图分类号:K56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5)05-0052-05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5.05.014

On the Decolonization Policy of British Conservative Government(1951~1956)

HANG Cong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Between 1951—1956, the British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tried to bridge the gap between the decay in British strength and the Empire's ambitions, and therefore adopted the policy of holding on and retreating and holding on first. The policy of holding on led to the Suez Canal War, bringing the British influence in the Middle East into a sharp recession, and the retreating policy accelerated the independence of Ghana, but retained part of Britain's influ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This lesson has affected the policies of following Conservative governments.

Key Words: Britain;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colonial retreat; policy of holding on; retreating policy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届英国政府中,1951 年至 1956 年执政的丘吉尔、艾登保守党政府是主观想法和客观结果相距最远的政府。这届政府任期内帝国并不平静。政府先后镇压了马来亚、肯尼亚和塞浦路斯的反英起义,暂停英属圭亚那宪制进程,流放塞浦路斯希腊人政治领袖、乌干达殖民地中布干达王国的国王,在英属苏丹和黄金海岸成立了自治政府,从埃及的苏伊士运河区、南非的西蒙德(Simon's Town)海军基地撤军,经历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灾难。这届政府通常被认为在帝国殖民政策上处于严格意义上的保守地位^[1],也有学者认为此届政府并不那么保守、被动,以较积

极的心态应对帝国难题^①。在我看来,前者主要从政策制定的主观动机出发,后者主要从政府处理的众多帝国事务及其客观效果出发。一直存在于英国政府帝国政策中主客观背离的情况在这届政府的任期内表现得最为突出。

从该届政府成员的主观想法来看,他们一心想巩固帝国并采取相应措施,却由于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严重削弱了帝国。显然此届政府未能正确认识英国国力进一步相对衰落的现实,及时跟上时代的发展。这成为理解后续的麦克米伦保守党政府实行快速非殖民化政策的基础。

从该届政府成员的客观作为来看,他们执政时期帝国各

^① 见马丁·林恩的《20 世纪 50 年代的英帝国——撤退或复兴?》(Martin Lynn, edit.,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1950s: Retreat or Revival?*), 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公司 2006 年版,前言。

地宪制改革的步伐比艾德礼工党政府时期更快。除了在印度、锡兰和缅甸进行了积极的宪制改革外,艾德礼工党政府在其他地区特别是非洲地区的政策相当地谨慎。考察工党政府的政策,其政策同其他届政府一样主张渐进地改革,想将变化限制在地方自治政府的政治妥协之内,想在反抗共产主义的名义下保持帝国的全球性结构。如果仅从提出的政策口号上看,丘吉尔、艾登保守党政府甚至比工党政府更向前迈了一大步。工党政府那里的“伙伴关系”概念在保守党政府这里被演化为“多种族社会”概念;工党那里的“地方自治政府”政策在保守党政府这里演化为“英联邦内自治政府”政策;在工党政府那里,预计非洲各地独立的时间为“一代人或更久”的时间,到丘吉尔、艾登保守党政府这里预计非洲各地独立的时间转变为“15年左右”,时间大为缩短。

丘吉尔、艾登保守党政府的这种主客观背离的政策形成的原因何在?是主观意识适应环境的产物?还是被迫适应的结果?

一、“尽可能地慢下来”与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

无论是同之前的艾德礼工党政府相比,还是同稍后的麦克米伦保守党政府相较,丘吉尔、艾登保守党政府突出的特点是不喜欢制定整体性的计划,政策思路上的探索基本停止了。丘吉尔解散了许多内阁委员会,实际上将政策制定的权力集中在更小的范围,经常由首相自己或者三、五个亲近大臣制定出应对性政策。这一政策制定方式体现出丘吉尔从以消极的态度应对帝国形势的变化,发展到艾登那里试图用武装干预的方式解决苏伊士运河问题,以挽救帝国的衰亡,然而却加速了帝国的解体。

丘吉尔曾提出战后长期被英国历届政府奉为主臬的三环外交政策,即视英国在欧洲的核心地位、在英帝国/联邦的超然地位、英美关系中的伙伴地位为捍卫英国国际地位的三大支柱。这三大支柱从政治上支撑了英国的国际地位,也可以说是从外交策略上维护了英国的国际地位。英国自身的经济实力则是支撑这三根支柱的核心。英镑的地位是英国经济实力消长的晴雨表。帝国政策的制定同英镑地位的变化息息相关,维持帝国需要一定的花费,增加的开销会削弱英国政府维护英镑的资源,而从帝国撤退则会损害外界对英镑的信心。尽可能廉价地维持帝国成为战后历届政府制定帝国政策的出发点之一。丘吉尔、艾登政府也是如此。

然而,在关乎帝国战略、经济利益的关键地区,在被认为受到共产主义渗透的地区,选择坚守仍旧被认为是必要的。丘吉尔以捍卫帝国著称,在制定《大西洋宪章》时,他坚持将

民族自决的权利范围限制在白人范围内,在战后屡屡反对工党稍显变革精神的帝国政策。在丘吉尔于1955年宣布退休后,长期辅佐他处理外交事务的艾登接任首相,继续奉行丘吉尔的方针。1955年保守党政府在塞浦路斯宣布“紧急状态”,镇压塞浦路斯人民的反英斗争是为了继续掌握在当地的军事基地;继续进行马来亚的殖民战争则是为了获取当地的美元出口品;1953年在英属圭亚那宣布“紧急状态”,武力中止合法政府则是出于反共产主义渗透的考虑。实际上对上述三个因素的考虑经常是综合的,如1952年保守党政府在肯尼亚宣布“紧急状态”,发动镇压“茅茅运动”的殖民战争,再如1956年艾登保守党政府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

丘吉尔、艾登政府要解决的帝国核心问题是在南亚次大陆独立后继续巩固其在印度洋的地位。要解决这一问题便需要估算英国的国力,其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外汇赤字问题。战后初期直到1950年代,依靠加大开发自己帝国的力度,恢复自身经济是英国政府一以贯之的政策。该计划在1951—1957年间运转得并不如原本设想得那样好。殖民地开发计划成效不好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投入不足。投入殖民地开发的资本以官方资本居多,作为官方资本掌管者的英国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并不十分乐意资金流向帝国,因为那样会恶化英国国内发展资金的缺口。私人资本也不积极向殖民地投资。在1950年代从伦敦资本市场筹集殖民地贷款也并非持续地受到投资者的欢迎。此外有限的资本集中在出口创汇部门,限制了殖民地经济长远发展的潜力。出口创汇的政策导向使得不少地区原材料生产有了迅猛增长,也有不少经济开发项目以亏损告终,如东非的落花生种植计划。总体上讲,殖民地开发计划虽然缓解了英国战后的经济困难,然而英国仍旧没有实现依托开发殖民地让自己摆脱周期性英镑危机的经济目标和让美国在经济上依赖自己的战略目标。在1950年代,英国分享的世界贸易额持续下降,英国工业品的竞争力也继续下降。尽管英国的货物在许多殖民地有关税优惠,英帝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然而英国出口到殖民地市场的份额从1953年的29%下降到1958年的23%,同时英国市场占殖民地出口货物的份额从31%下降到23%^[2]。上述经济数据反映了英国能投入到保卫帝国方面资源的程度。

如何在可承受代价的情况下保持帝国地位,成为丘吉尔、艾登政府帝国政策的出发点。时任财政大臣的麦克米伦认为英国经济地位依赖于世界对英镑的信心,更深层依赖于“我们保持自身作为伟大强权的能力”^①。英国应该继续在自己的帝国获得食物和原材料供应用于经济恢复。所以不仅现在的花费水平要保持,而且在某些特定区域有必要花得

① 英国内阁档案,CAB 129/52 Memorandum 'Economic Policy' (C(52)196), 17 June 1952,见戴维·高沃斯(编)的《保守党政府和帝国的终结(1951~1957)》(David Goldsworthy, edit.,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and the end of empire, 1951-1957*),伦敦皇家文书局1994年版,第3册,第369号文件。

更多。中东便是这样一个地区,接下来的 20 年中英国的燃料必定要依赖这一地区,确保英国公司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石油供应,更重要的是英镑石油对于维持英镑地位尤为重要。所以不能因为仅仅着眼于暂时性节约一些英镑,而坚持帝国,将能给予大众以骄傲和信心^①。艾登也反对收缩帝国,认为没有全球安全体系,英国将面临更大的外部威胁,更会威胁到宗主国国内的生活标准。特别是英国无法自给自足,只能通过贸易交换来保证经济运转^②。于是,尽可能维持帝国框架,不仅在政治上、心理上,甚至在经济上对英国人而言都是一种收获。哪怕是帝国局部的撤退,都会从上述三个方面损害英国人的利益。

正是由于资源的有限,艾登在处理同埃及关系上主张采用非军事的方式,这也是对工党政策的继承。出于节约花费的考虑,应用影响力和争取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被置于日益优先的考量位置上。非军事的方式包括教育、信息服务、议会交流、经济援助和军警训练等。艾登相信武装干预将最终破坏而非维系英国的影响力,相信只要包括埃及在内的亚非领导人不动英国的底线,英国便可以接受同亚非领导人的妥协。故而,在 1953 年内阁讨论苏伊士基地问题时,艾登鼓吹应用一种灵活的解决方式。他的主张可能听从了外交大臣的建议,在后者看来英国不能再希望用 19 世纪的方式保持自己的地位。如果使用武力,则意味着站在了中东地区崛起的民族主义者的对立面。保持英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最好方式是想办法驾驭民族主义运动,而非简单地站在对立面反对它们。要继续使用英国位于苏伊士运河区域内的军事基地,便需要准备镇压整个埃及人民的反抗,这将花费大量的金钱、人力资源和公信力。所以英国政府应该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撤退。在尽可能保障英国的战略利益的同时避免公开和埃及人冲突。1954 年英、埃达成协议,英国驻扎在苏伊士运河军事区的 8 万名驻军撤退,放弃在这块同威尔士面积相仿地区的权利,将在苏伊士运河区的军事基地转为后备基地,仅技术人员继续待在苏伊士基地中,保留英国军队战时重新进入苏伊士基地的权利。

到 1956 年年中,面对纳赛尔国有化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决定,艾登的解决策略经历了 180 度的大转折。英国政策制定者害怕他们立即丧失英国在中东的政治威望、英镑的稳定

性、英国投资安全和中东石油供应。对于英国官员来说,埃及人领导下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是对英国在整个中东地位的威胁,是对 1954 年协议的不尊重。显然,运河国有化政策触动了英国底线。在这样的担忧之下,苏伊士运河问题成为维持帝国的核心问题。艾登决定实行武装干预。历史证明,艾登在处理苏伊士运河问题时过高估计了自身力量,在发动武装攻击后,英镑地位直转急下,英国却毫无办法,不得不撤离苏伊士运河。

英国武装干预的失败说明了三个问题:①没有美国的支持,英国已无力进行一场殖民战争;②英联邦不再无条件地支持英国;③为了保证英镑地位,英国对帝国事务的财政支出需要重新详加考虑。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考察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结果。苏伊士运河危机启动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非殖民化吗?这需要通过分析非殖民化的动因来进行评价。①殖民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强弱是英国决定撤离殖民地的最重要考量因素,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民族独立运动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前便已展开,从这个角度看苏伊士运河危机并非直接促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非殖民化进程的因素;②这场危机对后续的麦克米伦政府制定整体政策有巨大的心理冲击,上任伊始便对整个帝国情况进行反复调研,以制定更为切合实际的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各殖民地快速地非殖民化;③从英国官员心理上讲,苏伊士运河危机军事干预的失败,让英国官员重新思考应用军事手段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在各殖民地和平交权;④苏伊士运河危机的武力干预使英国在接下来的十余年中成为联合国的头号公敌,刚好是各殖民地独立的时期,间接上为各殖民地独立创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包括官方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苏伊士运河危机是英属非洲帝国、甚至整个帝国瓦解的关键因素^③。我不否认英国政府军事解决苏伊士问题失败对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殖民化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理解撒哈拉以南非洲非殖民化需要更多地从当地民族独立运动,特别是 1957 年加纳独立的标志性意义入手。

二、“适应形势发展”与黄金海岸宪制改革提速

尽管丘吉尔、艾登主观上想让殖民地自治的步伐尽可能

① 英国内阁档案,CAB 129/78,Note, 'Middle East Oil' (CP(55)152),Macmillan to Cabinet,14 October 1955,见戴维·高沃斯(编)的《保守党政府和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 1 册,第 45 号文件。

② 英国内阁档案,CAB 129/53,Memorandum 'British Overseas Obligations' (C(52)202),Eden to Cabinet,18 June 1952,见戴维·高沃斯(编)的《保守党政府和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 1 册,第 3 号文件。

③ D. J. 摩根:《英国殖民地的自治政府之路(1941~1971)》,第 5 卷,(D. J. Morgan, *Guidance Towards Self-government in British Colonies*, 1941-1971, Vol. 5),麦克米伦出版公司 1980 年版,第 343 页。他认为苏伊士危机后重新评价帝国导致了自 1957 年起殖民政策的加速改变。W. R. 路易斯的《英帝国主义的终结:苏伊士运河乱局和非殖民化》(W. R. Louis, *End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scramble for Suez, and decolonization*),陶瑞斯出版公司 2006 年版,前言。他认为:如果说存在任何单独的大事件标志着非洲帝国的解体,这就是 1956 年苏伊士危机。

地慢下来,客观上大多数殖民地自治进程以不慢于工党执政时期的速度前进。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保守党政府在标榜自身同工党政府不同的同时,却采取了几乎一致的政策,甚至由于突发事件的刺激马来亚和黄金海岸比原计划更早独立。为了避免同民族主义领导人的冲突,保守党政府官员经常作出妥协,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承认理论上讲政治前行的速度有点过于仓促”^①。阻挠政治前进会冒着恶化独立后双方关系的风险,所以大臣们认为得不偿失^②。大多数政策制定者认为,黄金海岸或其他地区独立类似于让十几岁的姑娘掌握大门钥匙一般,再经过5—10年的时间准备独立或许会更好。传统的政策是不断少量地赋予土著人权利,尽可能地领先于土著人的要求一步。在英国政策制定者的心中,“稳步”向前的“移交”权利是理想中的模式,然而他们认识到,要想保持殖民地独立后对英国的善意,加速移交权力是必然的选择。非洲人已经迫切地想当自己的主人,无视任何管理和物质方面的困难^③。进入1950年代,传统政策不再可行,唯一可行的办法是让非洲人在掌握权利的过程中学习它。为获得“更多有责任心的政治领导人”的善意,英国政府不得不“以比‘我们’理想中预期更快的速度”^④前进。与工党政府类似,保守党政府认为加速宪制改革是保持殖民地政治领导人和人民对英善意和避免暴力对抗的最好方法。黄金海岸(今加纳)的案例体现了这一想法。

1951年,民族主义领导人恩克鲁玛在狱中仍旧领导自己的党获得选举胜利。稍后,他被释放并被任命为“政府事务领导人”。1952年2月,殖民大臣建议将恩克鲁玛的头衔变为“首席部长”。首席部长能够在总督缺席的情况下主持黄金海岸的部长会议,并能够提名部长人选。总督仅直接负责防务、外交、警察事务。英国官员的行为源于非洲人想取得政治权利的想法难以遏制。通过在黄金海岸成立责任制政府,英

国政府希望鼓励更多温和的政治家站到英国一边^⑤。一旦成立责任制政府,黄金海岸迈向独立就仅是时间问题了。

英国内阁、殖民部和非洲殖民官员系统内部都有不同的意见。先从非洲殖民官员系统来说,黄金海岸加快宪制改革步伐,遭到尼日利亚殖民官员的反对,认为会导致连锁反应,其他的殖民地将被迫跟随,而不管各殖民地发展的具体情况如何^⑥。在殖民部内部,有人怀疑恩克鲁玛组织政府是否会保持同英国的友好关系,导致殖民大臣李特尔顿不得不建议黄金海岸的部长们采取明确的行动展示自己反共产主义的意愿^⑦。在内阁层面上,财政大臣麦克米伦认为黄金海岸独立的前景将恶化英镑的地位,故加以反对^⑧。

为平息这三个层次的反对声音,1954年和1956年分别举行两次大选,以便确定恩克鲁玛的民意基础和发现一个有力的反对派。选举结果显示恩克鲁玛享有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没有一个反对派能与之抗衡。英国政府已难以在黄金海岸内部找到一个制衡民族主义者的力量。只有暴力措施才能遏制黄金海岸人民宪制改革的要求,而这又不是英国国力所能承担的。

加快黄金海岸宪制改革步伐的速度对尼日利亚的影响已无法顾及,如何保证黄金海岸独立后同英国友好的态度,成为研讨的主要问题。经济援助被认为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经济援助能够遏制恩克鲁玛抽取英镑池中资金的冲动^⑨,经济援助还能够遏制政治上的苏联渗透,而且是仅有的遏制方式^⑩。

一般而言,英国官员在考虑某个殖民地价值的时候都会用战略地位、反共产主义需要和对英镑区影响三个角度。黄金海岸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不具有战略重要性,反对共产主义需要和对英镑区的影响也可以用援助的方式进行干预。

① 英国殖民部档案:CO554/254, T. Lloyd to J. Macpherson(Nigeria), 5 March 1953, 见拉思伯恩(编)的《英帝国终结文献:加纳》(R. Rathbone, *British Documents on the End of Empire: Ghana*), 伦敦皇家文书局1992年版,第2册,第123号文件。

② 英国殖民部档案:CO554/805, Arden-Clarke to Gorell Barnes, 2 September 1954, 见拉思伯恩(编)的《英帝国终结文献:加纳》,第2册,第153号文件。

③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822/892, A. Cohen(Uganda) to T. Lloyd, 12 Janu 1954, 见戴维·高沃斯(编)的《保守党政府和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2册,第295号文件。

④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537/7181, Cohen to Mackintosh, 11 June 1951, 见拉思伯恩(编)的《英帝国终结文献:加纳》,第1册,第100号文件。

⑤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554/254, Minute, by Gorell Barnes, 5 February 1953, 见波特和斯托克韦尔(编)的《英国帝国政策和非殖民化(1938—1964)》卷2(Porter & Stockwell, eds.,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Decolonization*, 1938—1964), 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97页。

⑥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554/298, J. Macpherson to T. Lloyd, 18 January 1952, 见戴维·高沃斯(编)的《保守党政府和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2册,第263号文件。

⑦ 英国殖民部档案:CO 554/371, T. Lloyd to Arden-Clarke, 4 January 1954, 见拉思伯恩(编)的《英帝国终结文献:加纳》,第2册,第147号文件。

⑧ 英国内阁档案:CAB 128/30/2, CM 64(56)2, 11 September 1956, 见拉思伯恩(编)的《英帝国终结文献:加纳》,第2册,第253号文件。

⑨ 英国英联邦关系部档案:DO 35/6127, Galsworthy to Eastwood, 28 January 1957, 见拉思伯恩(编)的《英帝国终结文献:加纳》,第2册,第282号文件。

⑩ 英国殖民部档案:CO554/994, Minute, by Galsworthy, 23 January 1957, 见拉思伯恩(编)的《英帝国终结文献:加纳》,第2册,第279号文件。

在英国政府官员面前已经没有什么黄金海岸独立的障碍,而且黄金海岸的独立还有助于树立英国的良好国际形象,增强英国在联合国的地位。1957 年黄金海岸独立,国名为加纳。

如何理解保守党政府任期内加速的宪制改革,其速度甚至比工党政府还要迅速?

第一,民族主义运动在整个帝国范围内蔓延,使无论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认识到,要保持非洲人对英国的善意才能捍卫殖民地独立后的英国利益。他们害怕驱动殖民地民族主义者进入更为激进的地位。为了整体上使民族主义运动保持在较为温和的地位,英国政府经常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随着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英国政府认识到拖延宪制改革会危及亲英政治领导人的政治地位。所以,英国政府官员认为加速宪制改革是较好的措施。

第二,在冷战的时代背景下,对抗共产主义是争夺人心的需要。在 1950 年代,捍卫殖民帝国合理性成为一个“关键的冷战战场”^①。英国政府官员很担心延迟宪制改革会驱使民族主义者投向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外交部一直沉溺于搜集苏联关注非洲事务的证据。殖民部也担心苏联为增加自身影响力去积极支持对英国失望的民族主义者^②。因而,对于英国官员来说更快的宪制改革已成为冷战的一个策略。

第三,在国际反殖民主义的舆论压力的驱使下,英国不得不通过加快宪制改革步伐证明帝国的合理性。在 1940 年代晚期英国官员认识到国际舆论不支持殖民地的依附状态,要求快速地授予“任何形式的自治政府”^③。到 1950 年代殖民者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词汇,成为塑造英国国际形象的严重的不利条件^④。更重要的是,英属多哥兰、喀麦隆和坦噶尼喀是联合国托管地。宪制改革的速度缓慢使英国在联合国饱受批评。因而不得不保持一定的宪制改革速度让“托管委员会尝到合理的甜头”^⑤。出于此一目的,英国不得不做出主动的妥协而非等到压力集结完毕席卷而来。

第四,应对挑战力量不足是英国政府不得不做出妥协的直接原因。战后英国缺乏足够支撑大量常备军的国力。无论是在马来亚、肯尼亚还是塞浦路斯的军事活动,都要求长

期驻扎大量军队,但这会削弱主要的战略方向即西欧方向的力量。英国持续的财政困难限制了扩大军备、或者长期应用暴力方式镇压殖民地反抗运动。

总体上看,丘吉尔、艾登政府继承了工党在非洲的政策,不管他们采取延缓策略还是加快宪制改革的策略。在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以前,英帝国没有制定过系统的非殖民化计划。英国政府制定各种计划的目的是维持殖民统治。丘吉尔和艾登保守党政府一方面想坚持自己固守帝国的想法,这突出表现在处理苏伊士运河危机的问题上。苏伊士运河被埃及人收归国有使英国同时丧失战略地位、经济利益和政治威望,迫使艾登不顾一切地用武力维护帝国。另一方面,该政府也表现出尊重殖民地客观形势的一面,集中表现在处理黄金海岸宪制改革问题上。黄金海岸宪制改革不牵涉到英国的战略利益,对经济利益和政治威望的威胁可以凭借援助的手段加以干预,甚至能够收获到额外的政治威望,所以英国政府采用柔性的方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丘吉尔和艾登保守党政府的经历展示出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发展已经对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直接威胁。后任的麦克米伦保守党政府更多采用柔性方式来应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对丘吉尔和艾登保守党政府执政教训的最好吸收。

参考文献:

- [1] David Goldsworthy, Keeping change within bounds: aspects of colonial policy during the churchill and eden governments(1951—1957)[J]. Empire and the History, 1990, 18(1): 81—108.
- [2] Schenk C R. Decolonization and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the Free Trade Area Negotiations (1956—1958)[J]. Empire and the History, 1996, 24(3): 447.
- [3] 李安山. 日不落帝国的崩溃: 论英国非殖民化的“计划”问题[J]. 历史研究, 1995(1): 169—186.

(责任编辑:夏玉玲)

①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29/72, Memorandum, ‘Internal Security in the Colonies’ (C(54)402), Macmillan to Cabinet, 29 December 1954, 见戴维·高沃斯(编)的《保守党政府和帝国的终结(1951~1957)》,第1册,第18号文件。

②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537/7780, Memorandum, ‘Communist Prospects in East and Central Africa’ by W. Ingrams, April 1952, 转引自苏珊·卡拉瑟斯的《赢得心灵和思想: 媒介和殖民地反叛乱, 1944~1960》(Susan L. Carruthers,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British Governments, the Media and Colonial Counter-Insurgency* 1944—1960), 莱斯特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 161 页。

③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847/36/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n the Conference of African Governors’, 22 May 1947, 见罗纳德·哈耶(编)的《英帝国终结文献: 工党政府和帝国终结, 1945—1951》, 第 1 册, 第 59 号文件。

④ 英国内阁档案: CAB 130/113, Brook for Cabinet committee on Commonwealth Prime Ministers’ meeting 18 June 1956, 见戴维·高沃斯(编)的《保守党政府和帝国的终结(1951~1957)》, 第 2 册, 第 215 号文件。

⑤ 英国殖民部档案: CO822/912, Minute, by H. Bourdillon, 12 December 1956, 见戴维·高沃斯(编)的《保守党政府和帝国的终结(1951~1957)》, 第 2 册, 第 299 号文件。